学术评论

重观清朝

——北美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梅尔清 著 郑羽双 译

作为在北美致力于清史研究的学者，我们通常以英文发表学术成果。我们所处的学术社群，主要是非中国史领域的学者所构成。我们所服务的机构、发表文章的期刊以及获取资助的组织，正日益要求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要超越中国研究的范畴，还需与更广泛的学术社群建立联系，或至少确保我们的研究能被其他领域的学者所理解。鉴于此，我们重视并参与本学系内关于种族、科技、信息、法律、帝国主义、医疗、性别以及环境等流行话题的讨论；同时，我们也从中国同行那里汲取智慧与灵感，与他们展开对话交流，尽管后者的研究工作可能受不同的关注点与压力的驱动。这意味着我们目标受众具有多元性：首先我们的研究面向以英文发表成果的清史学者；其次，我们“期望”研究成果能够引起英语世界其他历史领域研究者的关注；最后，我们更期待这些研究能够漂洋过海，在中文世界“期望”讨论。总而言之，这一面向多元读者群体的写作特性，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所提出的研究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乃至最终呈现出的学术作品。

在本文中，我将重新审视清史研究，特别是北美清史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我的分析主要依据我自 2000 年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担任博士生导师的经历，以及我作为一位日益关注该领域长期发展的学者与在 2007 年至 2018 年期间担任《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编的经验。本文将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哪些长期的学术趋势影响了清史研究领域的近期发展？中美两国及其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与这些学术趋势相互交织，又在何种程度上为这些趋势的发展注入了加速的动力？近年来，制度性因素，如资助来源、招聘决策、人员流动以及研究生培养模式等，如何重新塑造了北美清史领域的面貌？诚然，其中一些问题或许难以通过量化手段精确解答，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机构、学术成果和研究生教育模式的观察，结合历史学的长期发展趋势，逐步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尽管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以清代为主题的英文著作已相继问世，但清史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蓬勃发展，实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并驾齐驱、相辅相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中国档案馆与图书馆的对外开放，直接激励了一代美国历史学者。他们通过与中国高等学府构建长期合作关系，得以深入探索与研读清代丰富的历史文献。与此同时，1979 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美国大学重新对华开放，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赴美留学。这一跨文化的交流与互相影响，为美国的清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领域，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两国间学

[收稿日期] 2024-11-20
[作者简介] 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郑羽双（1994— ），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候选人，yzheng76@jhu.edu

术资源的共享与北美清史领域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可以说这些机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清史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兴盛。此外，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支持也至关重要。这些因素包括清史研究博士生培养中心的多样化发展、中国研究领域就业市场的持续增强、研究与语言学习资金的相对充足、学术刊物数量的日益增长、教育基础设施（比如课程设置以及语言学习项目等）的日益完善，以及跨学科研究兴趣的兴起（如清史研究与历史学、艺术史、文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等。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推动美国学界形成了显而易见的“中国热”。与此同时，北美史学界对全球史、比较史，尤其是早期现代世界（early modern world）的研究兴趣，使得清史学者在边疆史、性别史、经济史、环境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对话者。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美清史学界的“黄金时代”。

正如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其同样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在美国书写清史》中所指出的那样，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北美地区的清史研究大多被整合进中国通史的整体叙述之中，而《清代名人传略》则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外。[①] 这部“极为重要和权威”的汇编，由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恒慕义（Arthur Hummel）牵头，集结了大约 50 位学者的努力，并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资助下，于 1943—1944 年出版。[②] 这一项目的成功彰显了北美地区一个正在扩大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该群体中的研究者，包括从中国移民而来的学者，都接受了充分的学术训练，能够利用清代的地方志、文集以及传记材料开展历史研究——这些材料也恰恰构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藏书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等私人基金会，不仅在《清代名人传略》的编纂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冷战前后，它们还广泛资助了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项目。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清史学界的发展与 20 世纪中期美国学术界自信扩张的趋势同步，当时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理解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对西方现代性的向往和对其优越性的认识，理所当然地认为清代及其以后的中国不具备追求现代化的内在能力。

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领导下，哈佛大学成为战后美国培养中国研究领域研究生的学术中心。费正清筹集资金，参与且主导了学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于 20 世纪 50 年代编纂出版了《清代史料入门教材》，供其学生使用。[③] 该教材日后亦成为北美中国史研究生培养的标准教科书。费正清培养的学生中，许多选择了与其导师的研究紧密相关的主题，例如 19 世纪的通商口岸、外交关系、传教士活动及贸易等。不过，在这一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求学并于 70 年代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先驱中，仅有极少数人的研究聚焦于 1820 年之前的历史时期。美国联邦与慈善基金的慷慨资助、持续不断的出版与翻译项目、移民学者的积极参与、图书馆的规模扩张以及课程体系的共享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为清史研究这一领域在哈佛大学，乃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华盛顿大学的日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然而，正如读者诸君所知，费正清及他的追随者往往倾向于将中国置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审视。尽管在当今美国学术界，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式已几乎遭到普遍摒弃，费正清所提出的二元框架的影响力已显著减弱，但是费氏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实质性影响，通过其在哈佛大学及其他机构所建立的制度性资源得以延续。

比如，费正清在推动清史领域学术团体与期刊的创建过程中便扮演了关键角色。1965 年，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度会议上，费氏携手其前学生、耶鲁大学的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等一众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清史研究会（Society for

---

① 罗威廉：《在美国书写清史》，林展译，《清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② Arthur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传略》）,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③ John King Fairbank, ed., *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清代史料入门教材》），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59）.

Ch’ing Studies)。韩书瑞（Susan Naquin）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 2015 年的年度会议中纪念该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的论坛上指出，清史研究会的诞生标志着“清史研究”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建立并具有制度性支持的众多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例如性别研究（Women’s Studies）与 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等。[①] 学会的创始人委托当时还是耶鲁大学研究生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创办了一份名为《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的出版物。创办之初，该杂志并未采取后来的同行评审期刊形式，而是作为一份面向对清代这一中国末代王朝感兴趣的新兴学术群体的“临时”(occasional)通讯。其内容涵盖研究笔记、征求反馈的短文、预告 1967 年亚洲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中两个——也是仅有的两个——清代相关分论坛的信息，以及一份国际清史学者名录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的原因，这一名录限于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人员。尽管如此，当时专注于 1800 年以前清朝研究的学者依然为数甚少。

在《清史问题》创刊号的编者按语中，史景迁构想了一个由该简报所支撑的新兴学术领域。他阐述道，通过简报发布正在进行的研究资讯，旨在帮助该领域学者避免重复研究；同时，通过分享初步的研究构想，作者能够获取关于其研究工作的反馈，进而提升研究的质量。也就是说，该刊物的核心宗旨在于汇聚众多分散的清史研究者，构建一个支持性的综合性学术共同体。史景迁还展望了举办联合工作坊、合作翻译项目以及数据收集与共享研究工具等社群合作的愿景。[②] 然而，讽刺的是，他所描绘的未来图景似乎预示着简报本身将会逐渐失去其必要性。至 1974 年，新任主编马若孟（Ramon Myers）在按语中声明，鉴于职业发展的需要，年轻学者亟须一个更为正式的同行评审平台，因此，《清史问题》或许需要在此方面作出调整。[③] 在马氏及其继任者韩书瑞、詹姆斯·科尔（James Cole）与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的引领下，这份简报逐渐转型为一份广受尊敬的学术期刊，为日益成熟的清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学术基础。

该期刊亦为学者阐述该学科潜在的未来发展趋势搭建了平台。1979 年，三位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者——费正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及马若孟，各自就清史研究的前瞻方向发表了独到见解。[④] 费氏预见了即将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转向，他呼吁学界加强对通俗文学、民众日常生活、志愿组织、亲属结构、女性历史以及非传教士群体的中国基督教历史等领域的探索。马氏则提议将明代与清代视为一个连贯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以便更深入地洞察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变趋势。傅礼初，作为内亚历史与语言学的权威，则倡导利用台湾近期开放且刚完成整理的档案资源开展研究，并着重指出边疆议题的研究价值。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满文作为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的重要性，尽管当时掌握这一技能的学者仍然寥寥无几。这三篇短文均展现出高度的前瞻性，预示了清史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重要维度。它们得以在《清史问题》期刊上发表，或许也表明该期刊终将成为清史研究领域的制度与知识支撑。

1985 年，当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与李中清（James Lee）担任杂志主编时，他们将其英文名称从 *Ch’ing-shih wen-t’i* 更改为 *Late Imperial China*（中文直译为《晚期帝制中国》，但该期刊的中文正式名称保持不变，仍然是《清史问题》)。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期刊管理与发行依旧维持着一种相对非正式的状态：编辑们宛如业务经理，甚至编辑部也仅设于李中清位于帕萨迪纳（Pasadena）的私人车库内，且当时订阅该刊的图书馆也屈指可数。直至 1992 年，这一局面才迎来转机。这一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威廉加入了编辑团队；次年，该期刊的出版

---

① Susan Naquin , “Remarks from Former Ch’ing−shih wen−t’i Co−Editor Susan Naquin, Professor Emerita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eeting in March 2015 on the Journal’s History”(《〈清史问题〉前联合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与东亚研究荣休教授韩书瑞在 2015 年 3 月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的发言》), *Society for Qing Studies*, accessed November 25, 2024. https://qingstudies.press.jhu.edu/about−us/anniversary/naquin.

②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Introit”(《引言》), *Ch’ing−shih wen−t’i* , Vol. 1, No. 1 (1965), pp. 1−4.

③ Ramon Myers（马若孟）, “Letter from the editor”(《编辑来信》), *Ch’ing−shih wen−t’i* , Vol. 3, No. 1 (1974), pp. 110−112.

④ 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 Joseph Fletcher（傅礼初）, Ramon H. Myers（马若孟）, “On Future Trends in Ch’ing Studies: Three Views”(《关于清史研究趋势的三个观点》), *Ch’ing−shih wen−t’I*, Vol. 4, No. 1 (1979), pp. 103−109.

工作转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接手。大约到了 2005 年，该期刊被纳入 Project MUSE 数据库，其读者群体与影响力随之进一步扩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史问题》的更名及其逐步走向专业化与读者群的扩张，与清史领域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头十年初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该期刊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更名，恰好与这一时期历史研究取向的转变相呼应——该时期的历史分析逐渐摒弃了以朝代为划分的方法，转而更加关注跨越更长时间段的经济与社会趋势，并且更加积极地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展开交流。美国的清史研究者开始用“晚期帝制”或 / 与“早期现代”来描述其研究领域。“晚期帝制”这一术语，涵盖了从 16 世纪商业革命至清朝终结的时段，意在将清代（及晚明）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中，以与其自身的早期与晚期进行对比。与之相对，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另一批美国学者则采用“早期现代”这一术语来描述从晚明至盛清的时代。相较于持“晚期帝制”观点的学者将清史置于“中国的时间”（Chinese time）之中，选择“早期现代”术语的学者则将清朝置于世界历史空间（world-historical space）之中，且更侧重于研究 18 世纪。这两个术语共同推动了该领域摆脱“(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二元对立的束缚，也使得那些对中国朝代的名称及特征不甚了解的非中国史学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清史。

受中国研究领域，乃至更宽泛的历史学界中社会史转向的影响，柯文（Paul Cohen）发表了其标志性且具有宣言意义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 在该著中，柯氏批判了战后美国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写，指出它们常被囿于“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Western Impact and Chinese Response）、“现代化”（modernization）及“帝国主义”（imperialism）等框架之内，并针对每个范畴列举了研究实例，剖析了其中的局限性。他认为，过往研究过于聚焦 19 世纪、通商口岸及传教士等话题。与之相对，柯氏提倡采用他所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China-Centered Approach），该视角着重于内部动态而非外部因素，且核心在于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国。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映射出 20 世纪 80 年代非西方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范式的广泛摒弃，以及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兴起。依柯氏之见，研究中国的学者应更多地关注内陆而非沿海地区，强调地方差异而非共性，重视社会的多元面貌而非单一视角。

柯氏的著作有力地反驳了西方优越与中国停滞不前的论调，恰逢美国学术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影响，开始审视自身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源之际。同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问世，也与能够身体力行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新机遇相契合。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益于富布赖特（Fulbright）项目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慷慨提供的奖学金支持，专注于清史的学者与研究生得以首次踏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研究，他们利用新开放的档案馆与图书馆资源，直接与中国教授及同行交流对话。此外，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欧洲的学生，尽管这一时期其数目仍然有限，选择赴美攻读中国历史相关的博士学位。这一现象促使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等高等学府的研究生群体日益多元化，且具备多语言背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清史研究逐渐呈现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局面。这一时期，众多著作相继问世，它们中的许多都是基于对新开放的档案材料的深入研究。例如，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②] 罗友枝（Evelyn Rawski）[③] 与盖博坚（R. Kent Guy）[④] 等学者，通过档案

---

①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③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④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资料深入剖析了清朝的制度。而其他学者则致力于探究地方社会及其生态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裴宜理（Elizabeth Perry）① 和周锡瑞（Joseph Esherick）② 在研究捻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时，便进行了这样的工作。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试图将清史纳入关于早期现代性的广泛讨论中，如罗威廉关于汉口的开创性研究；③ 或探讨中央行政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研究；④ 或如黄宗智（Philip Huang）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所做的那样，深入探讨华北农村贫困的成因。⑤ 同一时期，史景迁所著的几部畅销作品，凭借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独创性，使清史研究赢得了更广泛的公众关注。⑥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北美清史学者的共同关注点似乎更侧重于清朝社会如何按照自身的方式运作，而非探究为何“中国”未能实现（西方的）现代化。

此外，大学出版社也为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继哈佛东亚丛书系列（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之后，加州大学出版社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也推出了众多以清代为主题的书籍，随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也相继涉足此领域。此外，由孔飞力在哈佛大学编纂的历史文献阅读教材《清代文献导论》，集中体现了北美清史学者对清代档案的兴趣，并推动其发展。该教材于 1986 年首次发布，围绕 19 世纪初湖北钟人杰领导的起义案例，主要依据已出版的档案资料，为哈佛及其他高校学生提供了从奏折、谕旨、地方志等不同文体的多样化视角审视同一案例的机会。⑦ 因此，该教材为基于档案的社会史研究树立了实践典范；同时，它围绕共同的核心技能与知识体系，构建了一个主要由北美培育的第二代清史学者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尽管如今，这本教材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数字方法、文学与视觉材料以及边疆研究等新兴研究方法与取向所超越——但尚未被完全取代——它依然作为美国清史研究领域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保持着学科奠基的地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清史研究不仅迎来了社会史的转向，还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一些学者，诸如何伟亚（James Hevia）⑧ 和司徒安（Angela Zito），⑨ 开始探索当时在美国学术界风靡的各种文化理论；而对于另一些学者来说，他们对语言学的关注则体现在对满文训练的日益重视上。1993 年，清史领域的两位重量级学者——罗友枝和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在《哈佛亚

---

①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Joseph W.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③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⑤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⑥ Jonathan D.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Vintage Books, 1975; *The Death of Woman Wang*（《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Viking Press, 1978;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Viking Press, 1981;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Viking Penguin, 1984; *The Question of Hu*（《胡若望的疑问》）, Alfred A. Knopf, 1987;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太平天国》）,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⑦ *Harvard Research Portal for Ming-Qing History*（《哈佛明清历史研究门户》）如今已被数字化，研究者与一般读者皆可通过网站获取这一资源。网址：https://scalar.fas.harvard.edu/ming-qing-documents/index, 发布日期：2021-09-24。——中译者注

⑧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⑨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18th Century China*（《身体与笔：18 世纪中国作为文本 / 表演的大祀》）,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了满文在清朝时期的多重功能。[①] 文中，她们援引了支持满文学习的论点——这一观点可追溯至19世纪中期，旨在激励年轻学者迎难而上，利用这些满文资料为清代历史提供新的解读。例如，她们引用了白彬菊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如果不研读满文史料，就无法深入理解18世纪内廷的制度运作或满洲贵族的历史——这一观点与傅礼初1979年发表的短文相呼应。罗友枝于1996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说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阐述道，清朝作为多民族王朝的成功应该与其统治者的满族身份有关，而不应当被视为是“汉化”（Sinification）的结果。这种对身份、民族和再现（representation）的强调，为理解清朝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将清史研究置于由文化史理论与方法所塑造的全球早期现代（global early modern）框架中。[②]

在2004年《激进历史评论》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首次使用了“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这一术语来描述清史研究领域内新近涌现的一系列背景各异的著作。[③] 这些著作有的依据满文史料，聚焦于边疆区域，将清朝视为一个**帝国**；有的则探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性别等议题。卫周安为“新清史”这一新术语赋予了广泛含义，突显清史研究与整个史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她呼吁同行们重视清史研究与其他领域学者所做工作之间的关联性，并指出她所评论的书籍对清朝早期现代性持有一种更为正面的看法。与她所评作品相似，卫周安反对那种排他性的（exclusive）、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定义，而是着重强调盛清时期与欧亚大陆其他帝国之间的可比性（commensurability）、共时性（synchronicity）及相互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然而，自那以后，“新清史”这一术语的定义和使用范畴逐渐收窄；如今，无论是其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使用该术语来指代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即以满文及其他非汉族语言为核心，且至少在初期，主要聚焦于研究18世纪的朝廷动态。

通过将清朝置于一个指向内亚边疆的空间框架内，历史学家们发现，将其与其他早期现代帝国，诸如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公国等进行联系或比较，变得愈发富有成效。濮德培（Peter Perdue）、[④] 柯娇燕、[⑤] 欧立德（Mark Elliott）[⑥] 等学者的开创性研究，深入探讨了清朝在18世纪的领土扩张、意识形态及治理，为这一研究方向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柯氏所强调的，清朝统治者不应仅被视为“中华的皇帝”，亦应被看作中亚的可汗。正因清王朝兼具中亚与中原王朝的属性，清史研究者不仅要依托中文史料，还应充分利用满文材料。这类学术探索启发了年轻一代学者，使他们认识到掌握满文对于自身作为清史学者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另一组聚焦于边疆的专著，例如乔荷曼（John Herman）[⑦]、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⑧] 的作品，则着重阐述了清代西南边疆的领土扩张与地区治理情况。近年来，东南沿海被重新诠释为一种海洋边疆（maritime frontier），清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边界区域亦是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边疆研究焕发新的生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哈佛大学的资源与支持——并逐渐成

---

① Pamela Kyle Crossle and Evelyn S. Rawski, 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清史中的满语概况》）,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3 NO. 1 (1993), pp. 63–102.

②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oion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ember 1996), pp. 968–993.

③ Joanna Waley−Cohen , “The New Qing History”（《新清史》）, *Radical History Review*, No. 88 (2004), pp. 193–206.

④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身份认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⑥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⑦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云雾之间：13至17世纪贵州的拓殖问题》）,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⑧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变迁》）,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为清史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自 2016 年以来，《清史问题》期刊收到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投稿文章，同时，新的博士论文中，这一主题也占据了显著位置。

最近这些年，关于清朝边疆的研究已远远超越了“汉化”与“满洲”王朝的二元对立框架，转而采用一种多维度、多语言且富有民族志色彩或描述性的方法，来探究内亚、东北、西南及沿海等边疆区域。与第一代主要利用满文史料并侧重 18 世纪清朝宫廷作用的学者不同，以许临君（Eric Schluessel）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已经开始深入审视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内亚边疆在军事、政治、社会及宗教等方面的发展脉络。[①]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描绘了清朝边疆地区社会生活的图景，为我们将清朝与其他早期现代社会进行更为细致且具针对性的比较提供了可能。最近，部分学者还将目光投向了清代及其在 20 世纪遗留的长远影响。例如，政治史领域的新研究强调了清王朝在 20 世纪初致力于将自身塑造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努力。童楷文（Kevin Kind）在其文章《清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新探——以穆斯林与晚清新疆方志编纂为切入点》中，探讨了 20 世纪初清政权在西北边疆的知识生产及新型国家构建的尝试。[②] 同样，白瑞宁（Daniel Barish）在其著作《学习统治：宫廷教育与清朝国家的重塑，1861—1912》中也探讨了类似议题，不过他的焦点则集中于居住在北京宫廷中的年轻皇帝们所接受的教育课程设置之上。[③]

此外，对清代边疆史的研究已逐渐将历史学者的目光引向技术、知识生产、环境及物质性（materiality）等前沿议题上。马世嘉（Matthew Mosca）、[④] 边和、[⑤] 金由美（Loretta Kim）[⑥] 及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⑦] 等学者的著作，巧妙地运用了多种类型的史料，为读者展示了多元且高效的方法论体系。凭借“以边缘为中心”（centering the periphery）的研究路径——借用金由美精准而有效的描述——这些最新的学术成果更加关注基层社会的动态变迁，将地方社会与日常生活的政治带至历史叙述的台前。与此同时，这些著作也重新审视了科技与知识生产的议题，并对资源开采及自然环境给予了新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边疆研究促使学者们从更宽广的视角思考清代的环境问题。受当前生态危机的驱动，环境史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方兴未艾，而中国，也包括清代的经验，为理解全球环境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罗芙云（Ruth Rogaski）的新书《认识满洲：亚洲边疆的环境、感官与自然知识》堪称这一学术取向的典范之作。与众多近期出版的著作相似，该书的探讨范围超越了“清史”或“早期现代史”，延伸至 20 世纪的前半期。[⑧]

将清朝界定为早期现代王朝或欧亚火药帝国（Eurasian gunpowder empire）的视角推动了新一轮的历史比较研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的对比。这类中西比较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然而，与早期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史研究倾向于将“现代化失败”（failure to modernize）的中

---

① Eric Schluessel, *Land of Strangers: The Civilizing Project in Qing Central Asia*（《异乡人之地：清帝国在新疆的教化工程》）,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② Kevin Kind, Musulman Knowledge, Local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Qing Nation-State（《清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新探——以穆斯林与晚清新疆方志编纂为切入点》）,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42, No. 2 (December 2021), pp. 91–135.

③ Daniel Barish, *Learning to Rule: Court Educ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Qing State, 1861–1912*（《学习统治：宫廷教育与清朝国家的重塑，1861—191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④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破译边疆·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药之为物：早期现代中国的药学与文化》）,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⑥ Loretta E. Kim, *Ethnic Chrysalis: China's Orochen People and the Legacy of Qing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民族的蛹：清代边疆治理遗产与中国鄂伦春人》）,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

⑦ Jon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⑧ Ruth Rogaski, *Knowing Manchuria: Environments, the Senses, and Natural Knowledge on an Asian Borderland*（《认识满洲：亚洲边疆的环境、感官与自然知识》）,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国与“已工业化的西方”（the industrialized West）相对立的做法不同，近期的研究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下做出的回应。学者们不再拘泥于基于文化决定论的“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叙事框架，包括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内的众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修正主义的比较史研究，深入探究早期现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异同。[①] 他们发现，对比较的范围的强调（scale）使得比较更有意义。例如，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与西欧经济发达地区如英格兰进行对比，就显得更为合理。他们的研究成果揭示，至少在生活水平、农业生产力和商业活动水平方面，在所谓的“大分流”之前，清朝的某些地区与工业革命前夕的西欧之间存在着诸多共通之处。西方的现代化并非源自其固有的或长期的“优越性”，而应归因于化石燃料的偶然发现和对新世界资源的开发利用。

站在21世纪的视角回溯，有一种视角在新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即从构成部分（constituent parts）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这一视角深受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宏观区域分析（macroregional analysis）框架的启发，[②] 同时也受到学者对范围等效性（equivalency of scale）关注的推动，以及中国当前快速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此外，该研究路径亦受到当今美国历史学界盛行的“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范式的影响。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在其杰出的新作《遥远的海岸》中，生动地描绘了潮州移民在英属东南亚的有效且机会主义的参与场景。[③] 这些移民充分利用英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与政治投资，掌控了东南亚海域的商业活动与资源开采。值得注意的是，麦氏并未将这一现象简单地归因于清朝的衰落，而是着重强调了潮州侨民的开拓活力（expansive energies）与制度适应性（institutional adaptiveness）。麦氏的研究，与其学生丁林（Peter Thilly）的《鸦片生意》一样，[④] 两者都巧妙地运用了来自中国、欧洲及东南亚的档案资料。这两部著作均成功地将清朝置于全球视野之下，其叙述超越了国家成功与失败的简单二元对立，并在适当情境下，将“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等概念融入跨国华人的历史背景之中。

政治经济史的研究不仅通过跨时空的修正主义比较研究为清史领域引入了新颖的方法论，还极大地促进了对基层社会结构与金融秩序的重新思考。近年来，诸如张萌、[⑤] 墨安芳（Emily Mokros）、[⑥] 白莎（Elisabeth Kaske）[⑦] 等年轻学者的书籍和文章，深入探讨了长途贸易、新兴资金流动与借贷机制、木材种植业的证券化（securitization）、太平天国运动后厘金制度的变革、统治宗教与宗族组织的经济架构，以及早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时期采矿与制造业的经济与社会机制等议题。这些作品预示着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地方性史料的获取——学者们或通过实地调研，或利用按地方或主题编排出版的影印史料及数据库资源进行研究。此外，麦哲维（Steven Miles）出版的两部著作均聚焦于居住在广西的广东移

---

①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74.

③ Melissa Macauley, *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遥远的海岸：中国海洋边疆的殖民遭遇》）,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④ Peter Thilly, *The Opium Business: A History of Crime and Capitalism in Maritime China*（《鸦片生意：海洋中国的犯罪与资本主义史》）,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⑤ Zhang Meng, *Timber and Forestry in Qing China: Sustaining the Market*（《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⑥ Emily Mokros, *The Peking Gazet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te News and Political Authority*（《晚期帝制中国的〈京报〉：国家新闻与政治权威》）,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⑦ Elisabeth Kaske, Taxation, Trust, and Government Debt: State-Elite Relations in Sichuan, 1850-1911（《税收、信托和政府债务：四川国家精英关系，1850—1911》）, *Modern China*, Vol 45 No. 3 (1993), pp. 239–294.

民群体。[①] 他与被称为“华南学派”的学者紧密合作，其作品深刻展现了历史人类学这一融合民族志与历史学方法的研究范式的影响，彰显了对地方风貌与社群的深刻理解。

近几年来，清史学界对制度史也重新焕发了兴趣。随着数字资源的蓬勃发展，一些过去难以探究的宏大课题如今变得更为可能。此外，这些研究同样以更为积极的视角来审视清朝。以往，制度史研究往往倾向于将清朝制度与欧洲制度进行比对，进而得出清朝制度存在不足的结论。然而，近期的研究则更加注重理解某些现象与实践在清朝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实际功能与作用。例如，张乐翔对清朝捐纳制度的精湛研究，以及墨安屴对《京报》的深入剖析，均在此方面树立了典范。墨安屴并未将《京报》简单地视为现代报纸的前身，而是凭借翔实的史料，有力地论证了它在清王朝中作为信息传递工具与载体的作用。[②] 同样，张乐翔也指出，捐纳并非清朝腐败与衰落的表现，而是一种合法而且被普遍采用的机制，该机制既为国家开辟了财源，也为某些家族提供了巩固社会地位的渠道。[③]

清代法律史研究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成果丰硕。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档案相继开放，加之合同、信件、族谱等地方文献陆续集结出版，尤其是近年来法律史资料的大规模数字化，使得从法律视角探讨清代政治、地方社会及性别议题的学术领域始终充满活力。该领域早期曾受比较史学视角的主导，预设中国在成文法体系上不及欧洲。然而，近期研究已转向更为动态的分析路径。学者们围绕清代法律提出了众多丰富多彩且引人深思的问题：清朝法律在实践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法律案件记录，尤其是死刑案件，究竟传达了哪些关于法律态度、性别观念、道德以及社会治理的深刻信息？这些记录又揭示了身份秩序或家庭制度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哪些变化？法律知识在中国社会是如何被传播和接受的？我们该如何理解法律实践、成文法与断案小说之间的复杂交叉关系？在清朝全境，法律是否统一适用，还是像蒙古或受八旗管辖的社区那样，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 此领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资深学者，如苏成捷（Matthew Sommer）、[④] 戴真兰（Janet Theiss）、[⑤]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⑥] 步德茂（Thomas Buoye）、[⑦] 白德瑞（Bradly Reed）、[⑧] 柯塞北（Pär Cassel）[⑨] 和麦柯丽 [⑩] 等。他们不仅凭借自身的杰出作品为该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激励并培育了新一代法律史学者，如陈利、[⑪] 张

---

①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1850* (《上游之旅：人口流动与明清对华南的经略》),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② Emily Mokros, *The Peking Gazet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③ Lawrence Zhang, *Power for a Price: The Purchase of Official Appointments in Qing China*(《权力的代价：清代中国的捐纳》),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

④ Matthew 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 Janet Theiss, *Disgraceful Matters: 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丑事：十八世纪中国的贞操政治》),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⑥ 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⑦ Thomas Buoye, *Manslaughter, Markets, and Moral Economy: Violent Disputes over Property Righ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⑧ Bradly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⑨ Pä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审判的基础：十九世纪中日的治外法权与帝国权力》),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⑩ Meliss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⑪ Chen Li,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婷[①] 和张仲思（Tristan Brown）[②] 等。这些年轻学者勇于跨越不同史学领域的边界，综合运用书籍史、性别史、法律史及经济史等材料与研究方法，极大地深化了对清代法律、法律实践、印刷文化及地方社会的理解与探索。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头十年初，妇女、家庭和性别史领域的研究欣欣向荣。学者们以修正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以往弱小、不识字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高彦颐（Dorothy Ko）[③] 与曼素恩（Susan Mann）[④] 首次在英语世界中运用文学材料，尤其是诗歌，挖掘女性的写作，重现了江南地区精英女性的生活经历。费侠莉[⑤] 与吴一立（Yi-li Wu）[⑥] 则开创了性别与医学史的研究领域。戴真兰的作品对贞节崇拜进行了再思考，她不仅探讨了清朝皇帝如何利用这一价值观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还分析了普通女性如何利用国家倡导的道德观念来展现自己的能动性。[⑦] 戴真兰与苏成捷一样，都聚焦于性别与法律的交叉地带，且都有效地利用了他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大量档案。苏成捷的第二部专著关注清代中国的卖妻与多夫现象，将非规范的家庭形式视为穷人的一种生存策略。[⑧] 其研究依据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阐述了清代婚姻和家庭的规范价值具有明显的阶级特性，以及社会边缘群体所经历的残酷不稳定与生活的暴力。相比之下，卢苇菁的最新研究则展现了清代家庭生活的另一种修正主义视角。[⑨] 她挖掘精英家庭作为充满情感的空间的侧面，认为，至少在部分情况下，婚姻中的情感与对女儿的爱可以在这一空间中得到培养。与卢氏对情感的重视不同，艾梅兰（Maram Epstein）在《正统情感：盛清时期孝道之爱的叙事》一书中认为，孝道而非浪漫爱情才是清代情感生活的核心，但她对此并未作出任何价值评判。[⑩] 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的著作《墨与泪：俞氏家族的记忆、哀悼与书写》[⑪] 与曼素恩所著的经典研究《张门才女》[⑫] 有异曲同工之妙，该著通过考察俞樾及其家族成员所使用的物品和留下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亲密且感性的家族史叙述。显然，这些著作与探讨早期现代世界其他地区情感史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另一组最新研究则注重探讨物品及其产生所依赖的技术与制度。这些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中研究早期现代世界消费、贸易及技术的学者们展开对话，尤其受到了阿尔琼·阿帕杜莱

---

① Ting Zhang, *Circulating the Code: Print Media and Legal Knowledge in Qing China*（《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

② Tristan Brown, *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山川之典：风水与清代地方行政》）,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③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⑤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⑥ 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女人的再生产：晚期帝制中国的医学、隐喻与分娩》）,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⑦ Janet Theiss, *Disgraceful Matters: 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丑事：十八世纪中国的贞洁政治》）.

⑧ Matthew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清代中国的多夫制与卖妻现象：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⑨ Weijing Lu,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and Intimacy in Qing China*（《包办婚姻：清代中国的婚姻与亲密关系》）,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⑩ Maram Epstein, *Orthodox Passions: Narrating Filial Love during the High Qing*（《正统情感：盛清时期孝道之爱的叙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⑪ Rania Huntington, *Ink and Tears: Memory, Mourning, and Writing in the Yu Family*（《墨与泪：俞氏家族的记忆、哀悼与书写》）,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

⑫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张门才女》）,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Arjun Appadurai）主编的论文集《物的社会生活》的启发。[①] 这一新的研究路径与时下盛行的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现象暗合，同时也回应了快时尚与工业生产的发展趋势。通过追踪物品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轨迹，近期关于清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揭示了随时间演变的社会、文化、思想及政治模式。例如，近期对女性服饰、[②] 砚台、[③] 玉器、[④] 法律书籍、[⑤] 瓷器、[⑥] 戏剧及城市空间、[⑦] 书籍[⑧] 与药物[⑨] 的研究，集中关注了宫廷以及以文人、官员与旗人为代表的精英和市场动态的变化。这些研究展示了由生产、流通和消费构建的商业网络如何将这些物品（特别是书籍）与地域性品味文化和社会分层紧密相连。该商业网络最初聚焦于长江三角洲地区，随后在乾隆时期转移至北京。在某种程度上，这组研究凸显了手工艺人（artisans）的价值，以及工艺（craft）、物质（substance）和质地（texture）在早期现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这或许与我们当今强调快时尚和高度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一些学者还挑战了强调清朝在 19 世纪衰落的传统观点，指出这一时期无论是在朝廷控制范围之内还是之外，都仍存在着创新与生产力的另一种展现形式。

专注于品味、技术以及生产与消费等议题的文学与艺术史学者，也步入了所谓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之列，催生出富有洞见的跨学科对话。例如，艺术史学家乔迅（Jonathan Hay）的著作《魅惑的表面》拥有精美绝伦的插画，且深入探讨了艺术品味及奢侈品生产与消费等主题。[⑩] 此外，伍美华（Roberta Wue）、[⑪] 何彦晖（Michael Hatch）、[⑫] 米歇尔·马泰尼（Michele Matteini）[⑬] 及李启乐（Kristina Kleutghen）[⑭] 等艺术史学者的近期作品，也剖析了宫廷与社会间，乃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品味的交流互动，这些议题同样吸引了文化史学者的目光。文学领域，袁书菲（Sophie Volpp）通过分析虚构作品中对具体物品的使用或物品类别的描绘，揭示了横亘

---

①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物的社会生活：文化视角下的商品》）,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Rachel Silberstein*, A Fashionable Century: Textile Arti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Late Qing*（《时尚的世纪：晚清的纺织艺术与商业》）,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

③ Dorothy Ko,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④ Yulian Wu（吴玉廉）, “Chimes of Empire: The Construction of Jade Instruments and Territor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帝国的钟声：18 世纪中国的玉器乐器与领土的构建》）,*Late Imperial China*, Vol. 40, No. 1 (June 2019), pp. 43–85.

⑤ Ting Zhang, *Circulating the Code.*

⑥ Kai Jun Chen（陈恺俊）, *Porcelain for the Emperor: Manufacture and Technocracy in Qing China*（《皇帝的瓷器：清代生产与技术官僚》）,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3.

⑦ Andrea S. Goldman（郭安瑞）, *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文化中的政治 : 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⑧ Cynthia J. Brokaw（包筠雅）,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文化贸易 :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Suyoung Son（孙修暎）,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⑨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

⑩ Jonathan Hay, *Sensuous Surfaces: The Decorative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hina*（《魅感的表面 : 明清的玩好之物》）,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⑪ Roberta Wue, *Art Worlds: Artists, Images, and Audienc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艺术世界：19 世纪末上海的艺术家、图像与观众》）,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⑫ Michael Hatch*, Networks of Touch: A Tactile History of Chinese Art, 1790−1840*（《触觉网络：中国艺术的触觉史 , 1790—1840》）,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24.

⑬ Michele Matteini, *The Ghost in the City: Luo Ping and the Craft of Paint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城市中的幽灵：罗聘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绘画技艺》）,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3.

⑭ Kristina Kleutghen, *Imperial Illusions: Crossing Pictorial Boundaries in the Qing Palaces*（《帝国的幻象：清宫绘画边界的跨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差距。[①] 相比之下，另一位文学研究者邝师华（S.E. Kile）则将李渔视作文学策划人兼品味制造者，着重阐述其小说中涉及的技术及对物品的独到运用。[②] 由此可见，历史学、艺术史及文学学者都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对物品与图像的深入研究、对技术的浓厚兴趣，以及借鉴书籍史研究的方法，揭示了清代社会与小说世界中物品的流动轨迹。在此过程中，他们或潜意识地，或在某些情境下明确地，回应了关于其他早期现代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物质与视觉文化、身份及地方营造（place-making）的类似研究。

此外，北美中国研究领域中新兴的学科分支已孕育出专属的期刊、网站及学术社群。这些崭新的组织与出版物促使清史研究成为一个参与者渐增、成果丰富但议题相对零散的研究阵地。举例来说，北美的中国法律史学者创立了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w and History），并建立了学会官网，旨在国际层面扶持与推广其研究活动。[③] 同样地，专注于满文研究的学者们组建了满洲历史语言研究会（the Manchu Studies Group），并推出了在线期刊 *Saksaha*。[④] 研究书籍史、性别史、医学史、军事史及物质文化等相关主题的学者们也分别建立了独立的期刊、学会、Facebook 群组、在线研究社群等学术支撑体系。许多组织甚至跨越时空界限，覆盖了中国历史更广泛的时期，或将清朝置于东亚乃至更宽广的亚洲框架内考察。这些期刊包括《东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男女》（*Nan/nü*）、《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以及《中国军事史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等。在线社群则包括隶属于科学技术与医学历史联盟（the Consortium for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的“早期现代亚洲的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研究小组（the Craft, Techn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Asia research group）。[⑤]

疫情期间，学术活动打破了以往地点与预算的束缚，学者们组建虚拟社群共同研读文本，相互访问课堂，还举办了诸多在线讲座。这些技术驱动下的兴趣团体，仿佛是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它们有效地缓解了疫情带来的枯燥与孤寂感，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我们在疫情期间的生产力与学术参与度。这些活动大多以线上形式进行，为即时且成本较低的学术交流树立了典范。然而，这样的交流方式亦非尽善尽美。在美国，财力雄厚的机构往往能够订阅来自各国的数据库资源，而资源匮乏的机构则无力承担订阅费用；而且，近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中美学者间因数字平台差异而产生的新障碍亦不容忽视。此外，在线聊天与讲座终究难以替代面对面的深入交流，过度依赖数据库与搜索引擎，往往会削弱学者对档案的沉浸式感受，甚至剥夺了他们向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及同在查阅资料的其他同行学习的宝贵机会。这种模式也悄然改变着学术研究的方式，以往学者需通过不懈努力建立长期关系，而今对网络的依赖似乎也使他们丧失了这些机会。再者，当错误的搜索问题导致错误或误导性结果时，新的问题也会随之浮现。

身处这个数字时代，新技术将如何塑造我们能够提出、已经提出以及未来将要提出的研究问题？这些技术，以及持续变化的经济与政治格局，又将如何影响我们进行研究与培养学生时所处的机构环境？清史研究在 21 世纪的第三与第四个十年中，将走向何方？我们是否仍将继续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前辈学者所确立的范式内，挖掘那些熟悉的研究问题？这一领域是否会如当前趋势所示，跨越边界，进入跨国界研究的范畴？比如“跨国界亚洲”（Transnational

① Sophie Volpp, *The Substance of Fiction: Literary Objects in China, 1550–1775*（《小说之物：晚明至清中叶中国文学中的物象》）,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② S. E. Kile, *Towers in the Void: Li Yu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Media*（《虚空中的楼阁：李渔与中国早期现代媒体》）,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③ 参见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官方网站，网址：https://www.chineselawandhistory.com/，2024-11-25。

④ 参见满洲历史语言研究会官方网站，网址：https://www.manchustudiesgroup.org/，2024-11-25。

⑤ 参见“早期现代亚洲的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网址：https://www.chstm.org/content/craft-technology-and-material-culture-early-modern-asia-0，2024-11-25。

Asia）这一主题，尤其是其延伸至美国的研究部分，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及各种资助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的资助考量中，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发展趋势，对于专注于沉浸式研究特定国家文化与语言，如清代中国的学者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最后，广泛讨论的人文学科危机，对清史在美国的研究有着怎样更为广泛的影响？我们是否还会继续培养清史学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将在何处、如何培养？

北美地区的清史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受益于前所未有的开放环境，从而生产出了一大批卓越的研究成果。这些著作基于深入的档案研究，从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中汲取灵感，提出新的问题，并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在此期间，太平洋两岸的中美清史学科的发展，得益于一批真正跨越国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年轻学者；他们精通多种语言，且在两种学术传统中游刃有余。该领域的持续推进还有赖于越来越多的机构，在致力于中国史研究生教育的学者们的引领下，向博士生提供了慷慨的资助。此外，学术期刊的繁荣以及拥有跨国会员的学术社群的发展，也为北美清史研究的兴盛推波助澜。与此同时，清史研究在北美的高等教育机构中遍地开花，除哈佛大学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乔治城大学等院校，都见证了该领域的繁荣。再者，文学、艺术史与历史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且易于跨越，这不仅促进了学科间的交流互动，也推动了这三个学科的各自发展。这些跨界形式为清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显而易见，与五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北美清史研究，相较于五十年前呈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凝聚力也显著增强。

然而，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一领域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地方及机构层面的诸多挑战。人文学科的就业市场日渐萎缩，且美国学术界也愈发聚焦于国内与当下的议题。此外，如今由于奖学金数额的上涨，高校招收研究生名额逐渐减少。[①] 再者，由于大学出版社须要追求经济效益，与前现代人文学科相关的书籍往往首当其冲，面临被削减的命运。与此同时，资深学者的退休或离世，也可能对项目的连续性构成威胁——上述的部分项目已停止培养清史研究生，或大幅缩减了招生名额。加之，被全球新冠疫情打断的学术对话与交流至今尚未完全恢复。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场迫在眉睫的“末日”危机，它不仅危及北美的清史研究，也对全球范围内的人文学科构成了威胁。

尽管如此，我仍然努力地去怀抱希望。每当我阅读我的学生与年轻同事们的作品时，都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卓越的语言才能，以及他们为这一领域注入的灵活性（flexibility）与新视角，这让我深受启发。我依旧保持着一份审慎的乐观，或许我们能够找到克服当前挑战的方法：就业市场或可重新焕发活力，学界或能重新认识到跨越国界、深入前现代问题研究的存在主义价值。与其沉湎于对黄金时代的追忆，我更期待有机会参与并指导那些跨领域的研究项目，它们将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融合史料与方法，助力这一领域最终超越满汉、中西、传统与现代，以及民族屈辱与繁荣富强的二元对立框架。

① 美国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大多可以获得全额奖学金资助。但是近年来，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生活成本增长，高校博士生纷纷要求学校提高资助标准。作为回应，不少高校相继提高奖学金资助额度，但这也导致了招生名额的下调——中译者注。